



FOCUS

高层动态

2021年9月6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63.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本期目录

最新动向	3
【深改委第二十一次会议：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力度】.....	3
【习近平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5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市场主体纾困帮扶力度】.....	5
【习近平：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	6
【李克强：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7
【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幕 汪洋主持并讲话】.....	7
【韩正：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	8
【黄坤明：从严从实 标本兼治 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	9
问题探射	10
【弱化英语教育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	10
【过度医疗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	12
【共同富裕须精准提高民众收入能力】.....	16
人物关注	18
【湖南省副省长陈飞兼任湖南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18
智囊高参	20
【王小鲁：需求侧管理的关键是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间的结构平衡】.....	20
虎视寰球	2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伦理转向】.....	23
【智利扩产又增税 全球铜业揪心】.....	24
【供应链危机 全球航运业瓶颈难消价格居高不下】.....	26
华夏透视	29
【退休年龄改革需要社会观念变革与制度实践创新】.....	29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深改委第二十一次会议：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力度】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国家储备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加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增强防范抵御重大风险能力。要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要强化统计监督职能，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加快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反垄断监管，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我们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

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好“红绿灯”，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鼓励支持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加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等。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良好格局。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要加强竞争法律制度和政策宣传培训，强化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加强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执法司法。要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国家储备顶层设计，深化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对中央政府储备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物资储存和调运基础设施网络，国家储备基础和实力不断增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强调，我国是大国，必须具备同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储备实力和应急能力。要统筹解决好“储什么”、“谁来储”、“怎么储”的问题，系统规划、科学优化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加快补齐补足关键品类物资短板。要加快健全统一的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健全中央和地方、实物和产能、政府和企业储备相结合的储备机制，优化重要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分类分级落实储备责任，完善储备模式，创新储备管理机制。要完善战略储备市场调节机制，增强大宗商品储备和调节能力，更好发挥战略储备的稳定市场功能。要加大国家储备监管力度，发挥专业监管、行业监管、属地监管合力。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推动污染防治的措施之实、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污染防治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要求也更高。

会议强调，要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紧盯污染防治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推动污染防治在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快构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要统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扩大环境容量的同时，降低污染物排放量。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口，推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培育绿色低碳新动能。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全面强化法治保障，健全环境经济政策，完善资金投入机制。要加强系统监管和全过程监管，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决不手软，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罚。要注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体现差别化，不搞一刀切。

会议指出，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完善统计监督作出制度安排，查处了一大批统计违纪违法案件，统计监督取得明显成效。要加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统计监督，重点监测评价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情况、重大风险挑战应对成效、人民群众反映突出问题解决情况等。要加快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加大现代信



息技术运用，夯实统计基层基础，把情况摸清，把数据搞准，使监督结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要推动统计监督和纪律监督、组织监督、巡视监督、审计监督等统筹衔接，加强工作协调和统计监督结果运用，提升监督效能。（据新华社）

[Top](#)

【习近平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月 2 日晚在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习近平指出，让我们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坚持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9 月 2 日至 7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据新华网）

[Top](#)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市场主体纾困帮扶力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加强政策储备，做好跨周期调节；决定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稳增长、保就业，重在保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针对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增加、疫情灾情影响等问题，在用好已出台惠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稳住市场主体、稳住就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是加大帮扶政策力度。今年再新增 3000 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完善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企业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推动银行更多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建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风险补偿机制，支持担保机构为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记录的小微企业提供担保。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票据贴现和标准化票据融资，人民银行提供再贴现支持，缓解中小微企业占款压力。二是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增强发展信心。加大对创业创新的支持力度。严禁乱收费、乱摊派。继续开展清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专项行动。鼓励地方有针对性出台帮扶措施，减轻中小微企业成



本上升压力。三是统筹做好跨周期调节。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作用带动扩大有效投资。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加强政策储备，研究和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提高应对困难挑战的能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and 就业稳定。

为更好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安心求学、学有所成，促进教育公平，会议决定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一是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提高贷款额度，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由 8000 元提高至 12000 元，研究生由 12000 元提高至 16000 元，财政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实行全额补贴。二是财政继续对助学贷款承办银行给予一定比例风险补偿并合理调低补偿比例。三是引导学生勤俭节约，努力向学、学以致用，增强就业和报效国家、服务社会能力。学校也要努力为学生提供更多勤工助学的机会。

农产品质量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草案全面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管控。明确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完善监督措施，强化问责执法，大幅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据新华社）

[Top](#)

【习近平：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月 3 日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6 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今年 6 月，我同普京总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就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达成新的共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动力十足、前景广阔。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东北亚区域合作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重要机遇。各方应该立足地区，放眼世界，共克时艰，同谋发展。我们要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相互助力，加强疫苗研发、生产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坚决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我们要在推进互利合作方面持续发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要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形成合力，通过对话沟通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建设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努力，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 9 月 2 日至 4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论坛主题为“世界变局背景下的远东新机遇”。（据新华社）

[Top](#)



【李克强：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3日以视频形式出席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本次会议由法国政府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主办，主题为“同一个自然，同一个未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多国政要、工商界代表等与会。

李克强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满足生态文明理念，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面对全球自然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行动，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李克强指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要综合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加强海洋、森林、草原、湿地等保护，让生态系统恢复生机。强化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地、生态廊道修复，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李克强强调，疫情后推动经济复苏，是人类发展的必须，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要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发展绿色金融，研发推广绿色技术，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让绿色低碳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李克强表示，应对气候变化要坚持当前与长远相互兼顾、减缓与适应全面推进，通过节约能源、优化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森林、海洋等碳汇资源，实现共同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李克强指出，进一步完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坚持联合国在生态治理规则制定中的主渠道作用，寻求各方“最大公约数”。大国要显示担当，发挥正面引领作用。

李克强强调，中国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绿色转型。中国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连续30年实现“双增长”，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近期中国云南象群迁徙受到广泛关注，表明我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重视保护自然。中国积极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前不久，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中国正式上线。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大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四年一度的机制性会议，在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具有重要影响。（据新华社）

[Top](#)

【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幕 汪洋主持并讲话】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9月1日下午在京闭幕，本次会议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为主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强调，国泰民安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追求，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平安中国建设，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战略部署，领导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辟了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的新



境界，充分彰显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汪洋指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既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提条件。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坚持标本兼治、防控贯通，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有机结合，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要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牢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既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维护安全的物质基础，又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协调共进。

汪洋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人人都是创建平安的主体，人人都是享受平安的对象。广大政协委员要胸怀“国之大事”，发挥特长优势，扎实开展调研、深度协商议政，为平安中国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邹加怡、陈宝生、袁曙宏、钱小芊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邹加怡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增补潘立刚为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不再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袁曙宏为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陈宝生、钱小芊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接受陈放同志辞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闭幕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应邀作了题为“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学习讲座。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万钢、何厚铨、卢展工、王正伟、马飏、陈晓光、梁振英、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据新华社）

[Top](#)

【韩正：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9月3日在河北张家口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

初秋的张家口太子城碧空如洗，韩正来到有“雪如意”之称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详细了解滑雪中心场馆建设、赛道标准、周边绿化等情况，听取赛事组织和疫情防控情况汇报；前往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实地察看房间装修、院内景观布置，了解奥运村建设情况；到云顶滑雪公园考察滑雪公园改建及承办冬奥赛事情况，远眺滑雪场地建设情况；在张家口赛区规划临时展厅，听取张家口赛区场馆和配套设施整体规划、崇礼区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汇报。韩正在充分肯定前期筹办工作后强调，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要按规划高质量完成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精益求精做好运营管理。疫情是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大考验，要科学制定完善疫情防控的策略、政策和方案，对涉奥人员实行严格的闭环管理，努力做到精准防控。国际测试赛是对筹办工作进行全面实战检验的重要机会，要精心筹备好国际测试赛，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

太子城遗址为金代中后期的行宫遗址，距今已有800多年了，韩正来到太子城遗址公园，实地听取太子城遗址发掘、保护情况介绍，强调在赛区场馆和配套



设施建设中，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韩正走进太子城体育公园，步行察看公园建设和绿化情况；前往太舞滑雪小镇，了解小镇风情街；在太子城冰雪小镇，听取小镇总体规划和开发建设情况汇报。韩正表示，要突出绿色办奥理念，科学实施林草植被恢复和保护，打造好四季景观，营造优美的赛事和旅游环境。要认真研究冬奥会后赛事场馆的利用，发展壮大冰雪运动、冰雪事业，依托冰雪优势做好旅游开发，吸引更多游客，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生活。（据新华社）

[Top](#)

【黄坤明：从严从实 标本兼治 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

中宣部9月3日在京召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从严从实、标本兼治，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

黄坤明指出，近年来文化艺术领域综合改革取得成效，导向鲜明、积极向上的主流态势不断巩固。同时要看到，一段时间以来文娱领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和问题，败坏行业形象，损害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要直面问题、重拳整治，以坚决有力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效果。

黄坤明强调，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统筹推进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生态治理。要精准有效强化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监管，综合施治、协同发力，把树导向和明惩戒结合起来，规范市场行为、优化行业秩序、清朗网络空间，持续加强从业者教育引导，涵育良好文艺生态。要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创作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多样化文化需求。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据新华社）

[Top](#)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弱化英语教育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

最近对于教育减负和教育公平性有很多讨论，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分析过，只有通过改革现有的中考和高考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无效的应试教育（所谓“教育内卷”）和教育不公平（相关内容可以参考我之前的文章：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过度补课的难题）。仅仅通过禁止某些学科的课堂和课外学习来减少负担，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拿英语举例子，如果仅仅是弱化英语教学，反而可能会加剧教育的不公平。目前在很多弱化英语教育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对此梳理和分析一下。

■学英语有用吗？

对于一般人来说，英语用得当然没有数学或者汉语多。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认为学习英语的边际效应不如学习数学和汉语。比如对于一个小学刚毕业的普通学生来说，他掌握的数学和汉语，已经能够胜任很多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要求，相比之下，他掌握的英语水平可能还没有达到最基本的阅读要求。比如跟数学教育进行对比，对于普通高中学生来说，英语学习还是在补充基础，而数学已经在学习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所以高中阶段学习英语的边际效应并不一定低于数学教育。其实对于大多数工作，高中阶段的很多课程得到运用的机会可能都不多，但是包括英语、数学在内的这些课程，却有可能作为未来某些高端职业的敲门砖。

另一个角度是，看看企业在招聘测试时考哪些学科，这直接反映用人单位的实际要求。事实上，企业招聘时很少测试汉语和数学，更多的是测试逻辑，还有不少企业对于某些岗位测试英语，其中包括学术研究型职位、管理岗位以及某些涉外服务业，比如高档酒店的服务人员。未来中国最好的企业，大多都是国际化的企业，需要管理全球的团队，如果英语基础差，就可能失去很多晋升的机会。要知道在开国际会议时，只要有一两个人不会中文，大家就可能会使用英文。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企业在招聘某些岗位时会进行额外的英语测试。并非因为这些工作用英语的时候比数学和汉语多，而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数学和汉语已经能够胜任这些工作，但是很多人的英语平均水平可能真的还不够用。还有一个证据支持英语的边际效用可能不低于其他学科——非留学的成人英语教育的需求巨大且



稳步增长，可见即便脱离了高考和中考的指挥棒，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英语学习有利于个人的未来。

■机器翻译的局限性

有人说未来可以用机器翻译，不必学习英语。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学生们也不用背四则运算或者乘法口诀，因为电脑随时会帮你算。但是在生活中，你要拿出计算器来操作会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同样的道理，同声翻译和机器翻译工具也会有延迟和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大部分英语和汉语的词汇并非一一对应，有时一个英语单词很难找到准确的中文，反之亦然。例如，幸福没有准确的英文翻译（Happiness 对应是快乐，和幸福有微妙差异）。英文的旅行有 Trip、Journey、Travel 等好几个词，每个词都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中英文翻译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准确和不完整。相比之下，直接用英语可以避免各种不必要的误解。

■国家科研和文化的竞争力

有人说，只要少部分人会英语就可以了，那么多人学英语没有必要。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英语已经成了全世界的通用语言。如果一个韩国人到中国旅游，很有可能我们需要用英文来交流。中国人虽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也只是占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就好像国家曾经长期致力于推广普通话，目的是降低国内人民群众在相互交流过程中的障碍。那么，当中国需要进一步与世界进行交流时，学好英语，同样是降低障碍的最有效途径。未来的世界，是科技竞争的世界，创新也是全球化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闭门造车。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有些最新术语都还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所以就必须打好英文基础。文化和软实力的竞争更需要英文。刚才已提到，中英文之间并没有完全对应的精准机器翻译，如果要做一个全球化的游戏，或者拍一个全球的电影，都需要理解世界的语言。

社会整体的英语水平是国家重要的竞争力之一，中国要让更多的人到中国来旅游、学习和交流，那么中国的全民英语水平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美国当下不友好的态度下，中国人更需要和更多国家的人交朋友。但是交朋友用什么语言呢，大多数时候还是用英语，用机器翻译毕竟隔了一层。普及英语在世界科技文化竞争中的好处，也从英语母语国家的优势略见一斑。虽然说日本的经济规模和科技实力仅次于美国，强于英国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但是这些英语国家却比日本更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拥有更多的国际化公司和机构，并且拥有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这些优势和他们的母语是英语大有关系。母语并非英语但非常重视英语的国家，还有新加坡、荷兰、瑞士、德国和很多北欧国家等等，他们的经济国际化程度和竞争力也相对较高。印度虽然经济总体落后中国很多，却也能培养出现全球的顶尖学者和管理人才，这和印度的英语普及率很有关系。

有人说，我们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来学汉语。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只有当中国经济占据世界绝对优势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人口虽然占世界的百分之十几，但还是远远少于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人口，尤其总人口很快会被官方语言是英语的印度超越。而且中国的新生人口正在快速下降，已经不到世界的百分之十，这会增加汉语取代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难度。当然，汉语是非常优美和有诗意的语言，作为中国人，都应该为此感到幸运和自豪，未来也肯定会有更多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母语是英语的学生，基于商业或者文化的考虑来学习汉语。但对于绝大多数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来说，恐怕还是会首先学英语，这样他们很难有精力再学第三门语言。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汉语很难取代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

■培养顶尖人才和公平性并不矛盾



也许还会有人说，以上提到的需要用英文的场景只涉及到高端人才。但是人才的出现有很多随机因素，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不知道哪些小孩会成为顶尖人才，所以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普及英语教育，扩大未来顶尖人才的池子。如果只让一小部分孩子有潜力可以成为科研和文化的创新人才，那么我们可用的创新人才的池子就会小很多，导致我们选拔的尖子水平也会弱很多。

弱化学校的英语教育也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如果在学校里得不到高质量的英语教育，那么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高质量的英语教育，比如富裕家庭的父母本来就可能有较好的英语水平，可以让小孩出国旅游，或者参加国外的夏令营等。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尽管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很优秀，但是没有财力和机会去补英语的短板，未来在竞争顶尖创新和管理岗位上处于劣势。这对于减少贫富差距和提高社会流动性都是不利的。

有人说，学英语可以等要用了再学也不迟。但这是违反教育学规律的，语言越早学越好，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学习语言是事半功倍的。实际上，如果有更多孩子从小学习英语，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交流环境，那么孩子们从小就掌握第二语言并不那么难。反过来说，如果大多数孩子一开始就轻视英语基础，等到成年之后在工作中必须使用英语的时候，再开始学习恐怕就会困难很多。

有人说，因为学习英语太难了，或者成本太高了，需要很好的老师和语言环境，所以普通群体的孩子就是竞争不过富家子弟。但是这不是要弱化英语教育的理由，因为英语是有用的，弱化或者少考英语，在学校里可能达到了短暂的“貌似”公平状态，但是一旦到了社会上，就让这些普通家庭的学生直接处于职业生涯竞争的劣势，而那时再学要比青少年时困难得多，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认为必须中考和高考一定要考英文，实际上我认为应该取消现有的中考和高考，大学教育应该普及和去名牌化，我要反对的是弱化英语教育。要弱化英语教育的关键理由之一是，过去英语教育成本太大，只有精英阶层才能负担得起。因为英语教育不像数学，聪明的穷孩子自学就可以了，而好的英语教育需要好的老师和语言环境。但是这个瓶颈正在被最新的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所突破。一些领先的英语教育公司如新东方，VIPKID 等正在做这些尝试，例如可以通过网络让所有学生上最好的公开课，网络机器人可以模拟人和学生场景对话等等。可惜的是，这些尝试也许会随着整个民间教育行业的衰退而终止。

总结：基础教育中的英语教育具有比较高的个人和社会边际效应，还没有达到内卷很严重的程度。尤其是未来中国要成为全球的科技和文化创新的领导者，需要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如果人人都有基础的英语水平，那样优秀人才的池子就会大很多。反之如果只有富裕家庭可以获得很好的英语教育，反而会减少普通家庭的孩子成为顶尖人才的机会。现在英语教育的高成本问题，可以通过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很好解决，这样就可以普及高质量的基础的英语教育，提升英语教育的效率和公平性。在英语教育上，提质增效和公平性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促进的。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作者：梁建章，携程集团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Top](#)

【过度医疗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

近年来，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看病难、看病贵”等



问题得到了较大缓解，但过度医疗问题仍然存在。今年4月，某知名三甲医院大夫曝光“肿瘤医疗不良行为”的事件，就反映了过度医疗的危害以及公众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过度医疗为何屡禁不止，其症结在于各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关系不清、发挥作用不充分。有效遏制过度医疗问题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的内在要求，有必要尽快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一、中国如何治理过度医疗问题

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诊疗权威指南和公认基本原则，对患者采取超出治疗需要的不当诊疗措施的行为，通常表现为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住院、过度耗材、滥用手术和抗生素等。中国近年统筹医疗、医药、医保三个领域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使过度医疗有所减少。比如：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引导医院主动减少大检查、大处方。加强药品流通环节监管，降低需要向患者转嫁的医药成本。推进医保支付改革，规范医生诊疗行为。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护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公民医疗卫生素养不断提高。

表 1 近年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有关费用情况

年份	公立医院收入增速 (%)	公立医院药品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	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费用比重 (%)
2010	—	41.8	24.0	35.3
2011	20.0	40.5	24.4	34.8
2012	22.1	40.1	27.0	34.3
2013	15.6	38.8	27.9	33.9
2014	14.7	38.0	22.2	32.0
2015	10.6	36.2	30.6	29.3
2016	11.6	34.3	31.7	28.8
2017	9.4	31.1	33.3	28.8
2018	10.1	28.7	34.4	28.6
2019	12.6	28.3	36.0	—

中国在取消药品加成基础上，通过理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和医疗服务项目的比价关系，适当降低检查、检验等价格，提高技术劳务价格，推动建立新的补偿机制和运行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公立医院收入增速由2011年的20.0%降至了2019年的12.6%；全国公立医院药品收入占比已从2010年的41.8%降至2019年的28.3%，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占比已由24.0%增至36.0%。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2010年的35.3%降到2018年的28.6%。这不仅减轻了患者的负担，也减少了对患者健康的不必要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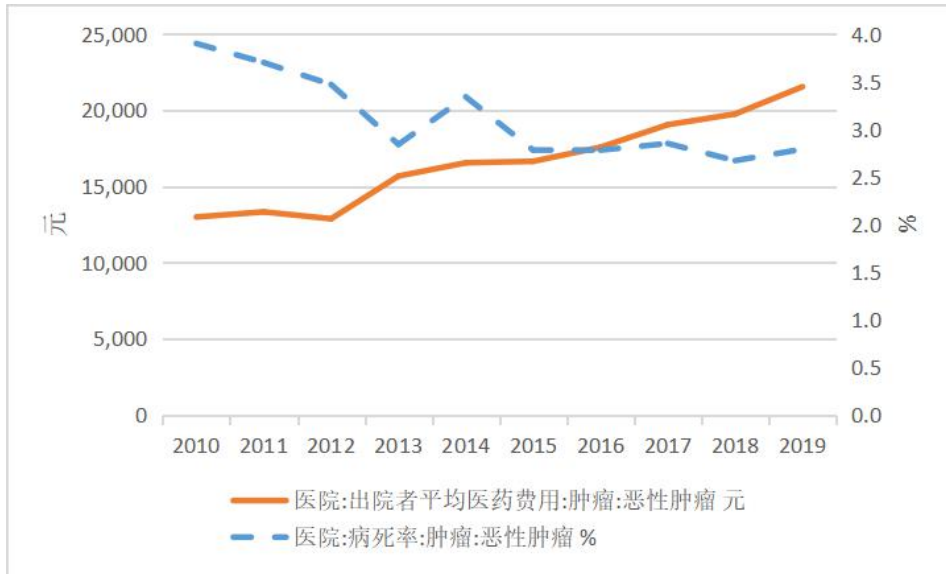
二、过度医疗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治理体系不健全

尽管中国过度医疗治理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应看到过度医疗依然是中国医疗领域的顽疾。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增长速度分别是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的6.30倍、3.61倍、3.11倍、2.11倍，是新加坡、巴西、印度的2.29倍、2.26倍和1.94倍。以癌症为例，近年中国恶性肿瘤患者出院平均医药费用持续增长，但患者的医院病死率下降幅度却很有限（图1）。再比如，中国卫生部门要求CT阳性检出率应达到80%以上，但实际情况是阴性检出率超过了80%。因过度医疗造成的健康受损、经济损失、体



力消耗、精神刺激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图 1 中国恶性肿瘤患者出院平均费用和医院病死率



过度医疗问题为何屡禁不止，从治理角度看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部分医院依赖“以药养医”，内部监督乏力。中国公立医院多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财政保障的医院运行经费、人员薪酬资金不够，2019年财政补助收入仅占全国公立医院总收入的11.1%，而人员支出占公立医院总支出的比重高达36%。医院为了维持运行，依靠药品、耗材、检查来“创收”，为了调动医生积极性，往往将创收业绩与医生薪酬挂钩，导致“以药养医”局面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医生追求经济效益的绩效考核导向，与患者维护健康的目标不一致，导致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不以患者为中心的过度诊疗行为。尽管各级医院已普遍建立医德医风评定小组，并要求考评结果与医务人员绩效、评优、晋升等挂钩，发挥了一定的同行自律与约束作用，但同一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利益共同体，自我庇护现象在所难免。

（二）符合医疗行业特色的人事薪酬制度尚未建立，个别医生医德医风有待提高。医生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长、准入门槛高、收益回报慢，但符合医疗行业特色的人事薪酬制度尚未建立，薪酬水平未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医生具有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消费决策重要影响者的双重角色，加之绩效工资为导向，过度医疗成为其提高个人收入的重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是医师的神圣职责，履行医师职责、遵守技术操作规范和职业道德、关心爱护和尊重患者是医师的义务。现实生活中，个别医生为了个人经济利益或规避误诊责任，不遵从权威诊疗指南，引导患者使用更贵但不必要甚至有害健康的检查和药物，职业操守和医德医风有待提高。

（三）患者医疗卫生知识缺乏，法律维权能力不强。医疗卫生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特点，信息高度不对称。一方面，2019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只有14.2%，患者和家属缺乏相关知识，容易迷信贵药、高精尖诊疗设备，加之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增加，部分患者甘愿接受甚至主动要求过度医疗。另一方面，患者在医患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鉴别医生的过度医疗行为，即使对不良治疗行为有所察觉，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医疗司法维权程序繁琐、费用高昂，司法救助力度有限，患者难以有效进行事后追责。

（四）一些医药企业、经销商及其代表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业自律不够。



长期以来，医药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医药企业、经销商及其代表“带金销售”，诱导医生吃回扣，这些成本最终通过过度医疗等方式转嫁到医保和患者身上。行业自律在信息不对称的医疗卫生领域尤为重要，但中国医药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明显滞后，自律意愿和能力不强。

（五）监管部门有被监管对象俘获的风险，监管能力还有待提升。过度医疗屡禁不止反映了医疗监管能力的不足。当前一些地方监管部门制定了严格的医疗服务机构准入标准，使公立医院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处于医疗服务供给的垄断地位。数据显示，2019年公立医院总收入占全国医院总收入的比重高达87.8%。一些医院为了长期利益通过“寻租”俘获监管部门，导致监管部门和医疗服务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社会监督是政府监管的重要辅助和信息来源，但一些地方医疗监管部门收到患者投诉后，往往将其转回医院处理，没有履行应有的监管职责。同时，监管部门依托医疗医保信息系统进行数字监管的能力也亟待提高。

三、发挥多主体协同治理作用，加快解决过度医疗问题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求我们深刻认识解决过度医疗问题的紧迫性，遵循维护人民健康的宗旨，将健康理念融入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所有政策，明确各主体治理职责，发挥多主体协同治理作用，尽快解决过度医疗问题。

（一）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加强财政对公立医院的保障力度，减轻医院创收压力。推进总额预付、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等医保支付改革，引导医疗机构控制成本，减少过度医疗。深入推进医药分开，建立完善医保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双通道”谈判药品的管理机制，鼓励药店承担医院药房服务。加快公立医院医护人员薪酬制度改革，探索与服务质量挂钩、公益导向的年薪制，提高薪酬待遇，保障医护人员合法体面收入。为医护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建立诊疗风险和责任分担机制。建立医院院长、科室主任、主诊医生医疗行为负责制，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职位职称晋升挂钩，引导医院、科室和医生主动抵制不良医疗行为。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增加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性，发挥市场对医疗服务的调节作用。

（二）创新政府医药卫生监管方式。加快整合医疗服务、医保、医药采购信息系统，探索建立在充分保护隐私基础上的公开患者病情和诊疗方案的信息平台。基于大数据技术，加强对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医生医疗行为的记录和监测，对大幅偏离同类疾病医疗费用、检查次数、用药剂量、住院时间等平均水平的医疗行为进行研判、复核和预警。将不当医药营销、过度诊疗信息纳入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加大对过度医疗行为的处罚力度，根据行为恶劣程度进行警告、罚款、吊销执业资格证书、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理。畅通患者线上线下投诉渠道，规范投诉以及处置流程。由法院强制执行过度医疗的惩罚措施，缩短患者维权时间。加强医疗服务、医药采购及医疗卫生监管领域的反腐，形成风清气正的医疗服务生态。

（三）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医药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约束和惩罚恶性竞争和不良推销行为。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制定诊疗规范和指南方面的专业权威作用，设置诊疗红线，引导医生规范诊疗。借鉴香港医务委员会设置道德事务委员会等经验，发展医务道德事务委员会，鼓励组成专业委员会，定期抽查医疗档案，研究和复核与医学道德和职业操守有关的案件，就医德医风事宜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建立同行相互监督的保护机制。



（四）提升医生职业能力、操守和地位。加强学校循证医学教育，将循证医学理念融入临床培训和诊断。将德才兼备的人才理念融入医生培育、选聘、使用、激励全过程。严格遵循患者知情原则，引导医生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减少诊疗随意性。加强医生医德医风教育，建立和完善医生声誉评价和激励机制。畅通医护人员职称评聘和职位晋升通道，增加各级各类党政代表、委员配额，加大荣誉表彰力度，提升职业地位和荣誉感。

（五）增加公众健康和医疗知识。高度重视健康和医疗知识的普及。各级电视台、报纸、网络媒体普遍增设健康模块，定期邀请专业人士进行健康促进、就医行为等方面的知识普及和宣传，引导患者科学适度就医、合理安全用药、不迷信昂贵诊疗技术和药品，不断提高对医生过度诊疗行为的鉴别能力。大力发展医疗社会工作，加强对患者的社会帮扶。

【来源：澎湃新闻，作者：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伟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Top](#)

【共同富裕须精准提高民众收入能力】

“共同富裕”是当前的热词。何谓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路该如何走？社会上有不少讨论。平均主义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吃过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亏。在“大锅饭”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体系低效。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当前，一小部分人不仅财富来路可疑，而且高调炫耀，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杀富济贫”不是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企业家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承担企业失败的风险，社会舆论容易被“幸存者偏差”所左右，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而容易忘记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实际上，成功企业家的高收入是建立在失败企业家的损失之上的，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层面上，让潜在的企业家打平他们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成本。

笔者认为，共同富裕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托底”，另一个是“提升”。“托底”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让民众摆脱对衰老、失业、疾病和匮乏的恐惧；“提升”就是提升民众的收入能力，让所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的收入。社会保障不仅是社会福利，也可以促进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它降低了掉入贫困陷阱的风险，民众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从事有一定风险、但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活动，比如开个小店、发明一项新技术，或者开办企业等等。提升民众收入能力是“授人以渔”，让低收入群体依靠自身获得更高的收入，缩小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换言之，共同富裕不是要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拉下来，而是要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上去。

这样的目标，与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一致的。我国古代社会就有社会保障机制。南方地区长期存在各种族田，为本族成员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宋代开始有政府承办的福利制度，救助老弱病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公平观是建立在古老的比例原则之上的。这个原则是轴心时代先哲们所秉持的公平原则，孔子、孟子、墨子以及亚里士多德都相信，一个人得到的回报应该与他的能力和努力成正比。儒家和墨家更是提出了政治贤能主张，认为选贤任能是分配政治职位的原则。这些原则



仍然被今天的中国人所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

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一次分配的原则是按要素分配。计划经济时代强调按劳分配，但没有严格执行，而是以“大锅饭”为主。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之一就是放弃“大锅饭”，实行按要素分配，劳动、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按照它们的边际贡献获得报酬。从理论上讲，按要素分配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宽泛的形式，因为劳动力之外的各种要素说到底都是劳动积累的产物。按要素分配不仅可以提高各种要素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可以让市场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指导资源的流向和配置，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

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按要素分配要尊重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同时也难免受到能力和努力之外因素的影响，因而必然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和再分配对收入和财富进行二次调节。但调节不是简单的“削峰填谷”，把从企业和高收入者那里收到的税收分给低收入者就了事，而是精准地提高民众的收入能力，这样才能获得持续的共同富裕。

在今天的中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提升收入能力的关键；一夜暴富的草莽英雄时代已经结束。但中国的教育水平分布不均，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已经趋于普及，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教育水平才刚过初中。教育的阶层固化也日趋严重，子女教育水平与父母教育水平的相关性已经回到了上世纪 30 年代的水平。家庭的教育投入出现分化。中等收入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视，“鸡娃”和焦虑成为常态；低收入家庭出现躺倒、放弃孩子课外辅导的状况。

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笔者认为，实行小学和中学各五年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小学生的无效竞争，也有利于政府教育投入的均等化。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待遇，吸引优秀教师长期扎根农村学校，也是实现教育均等化的有效措施之一。

三次分配是厉以宁先生 30 多年前提出来的概念，自愿是它的原则。在这方面，一些企业家做出了表率，他们积极投入我国的慈善事业，是慈善捐款的主体力量。但是，就促进共同富裕而言，三次分配只能是锦上添花，因为其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它更多的是体现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而不是强制性的再分配。最适合三次分配发挥作用的地方，是救助社会保障无法触及的贫困领域、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资助以及引领社会的文化艺术事业。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Top](#)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湖南省副省长陈飞兼任湖南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湖南省副省长陈飞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据湖南省国资委官方网站消息，8月31日，湖南省国资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省国资委主要领导同志调整的决定：陈飞同志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陈飞，1963年11月出生，曾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17年底调湖南省工作，次年1月起任湖南省副省长。原任湖南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的是姚来英，2019年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今年5月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据湖南省国资委官网）

青海省委常委王宇燕调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据鲁祖轩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王宇燕同志（女）任山东省委委员、常委。另，9月2日下午，青岛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和省委关于青岛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王宇燕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身份出席会议。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王宇燕，女，1966年5月生，曾任河南省济源市市长、济源市委书记，山西省运城市委书记等职务，2017年调任青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据鲁祖轩微信公众号）

辽宁省委常委陆治原调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据齐鲁网消息，9月2日下午，青岛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宇燕宣读了中央和省委有关通知。中央批准，陆治原同志任山东省委委员、常委和青岛市委书记。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陆治原，男，1964年8月生，曾长期在陕西省任职，历任榆林市委副书记、市长，渭南市委书记等职，2018年1月升任陕西省副省长，同年9月调任辽宁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据齐鲁网）

张柱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据天山网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张柱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显示，张柱，1968年出生，曾任宁夏中卫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7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固原市委书记，今年2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据天山网）



陕西省委常委梁桂调任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据《江西日报》消息，9月1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梁桂在吉安市调研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上述消息显示，梁桂已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梁桂，1964年8月生，曾任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陕西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等职务。（据《江西日报》）

张雨浦任银川市委书记 张柱不再担任

宁夏新闻网“领导活动集”栏目近日进行更新，据最新资料显示，张雨浦已任银川市委书记。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显示，张雨浦，回族，1962年8月生，长期在黑龙江省任职，2016年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近日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原任银川市委书记的是张柱，1968年出生，曾任中卫市委书记，2017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固原市委书记，今年2月任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据宁夏新闻网）

范锐平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据吉林省委政法委微信公众号“平安吉林”消息，8月31日，吉林省委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干部会议，宣布省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决定。8月26日，中央批准范锐平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8月30日，省委研究决定范锐平同志任省委政法委书记。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范锐平，1966年4月生，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曾长期在湖北省工作，2013年调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7年任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近日，施小琳已接替范锐平任成都市委书记职务。原任吉林省委政法委书记的侯渐珉今年5月已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据吉林省委政法委微信公众号）

黑龙江省委常委张雨浦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据《宁夏日报》消息，近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张雨浦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张雨浦，回族，1962年8月生，长期在黑龙江省任职，曾任鹤岗市委书记，牡丹江市委书记，2016年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据《宁夏日报》）

刘小涛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刘小涛同志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刘小涛同志兼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刘小涛，1970年7月生，长期在广东省工作，曾任汕头市市长，潮州市委书记，广东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务，去年4月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原任温州市委书记的陈伟俊此前已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Top](#)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王小鲁：需求侧管理的关键是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间的结构平衡】

■需求侧管理提出的背景、内涵和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需求侧管理？在我看来，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除了存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以外，也存在需求侧的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公平竞争机制受到干扰，导致了资源配置失当、效率下降，出现结构性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等现象。需求侧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失衡。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投资率（或称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消费率仍然过低。当外需相对走弱，不能起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就会出现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增长疲软等结构失衡的现象。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世界平均水平和大部分国家的水平，消费率都长期保持在80%以上，投资率低于20%。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期间，消费率大体保持在63%左右，投资率大体在36%左右，上下波动仅在几个百分点范围内。这个比例对我国来说大体合理。但在2000年-2010年这段时间，我国投资率大幅上升至47%，消费率下降至49%，这期间就出现了需求结构的失衡。其中在2008年-2010年期间，我国曾一度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加速了这样一个需求结构失衡的趋势。和改革开放早期相比，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在2010年以后，伴随着外需减弱，我国就出现了严重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效率下降、债务杠杆率过高等一系列结构失衡现象。随着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2015年以后我国经济脱离了高速增长轨道，而且增长率还在继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GDP增长率降到6.0%。2020年我国投资率是43%，比2010年的水平有所回落，但是仍比2000年前高出七八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3个百分点以上；2020年我国消费率是54%，比2000年前低八九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个百分点以上，所以，目前我国投资率仍然过高，消费率仍然过低，不利于启动内需，不利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今年我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经济增长加快。随着疫情情况的改善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回升，我国的出口额加速增长。但是未来一旦外需回落，内需不足的问题还会再次出现，所以我们更需要未雨绸缪，做好需求侧管理。在我看来，需求侧管理的关键就是要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纠正过度投



资、低效投资的情况，让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好的带动作用，促使经济增长回归到健康、可持续、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轨道。如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如何通过创新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实施需求侧管理？

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市场配置资源受到干扰的问题，比如存在垄断、过度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受到干扰等现象，或者有些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过度干预，对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等等。这些情况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配置不合理，出现一系列供给侧的问题。对于这些情况，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应侧重于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需求侧管理针对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不是同一个概念，总需求管理讲的是总量，比如说总需求不足，居民消费过低，储蓄率过高，这种情况下投资低于储蓄，怎么办？通常的办法就要刺激投资，使得总投资等于总储蓄，由此来提高总需求。这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总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

但是需求侧管理针对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国目前存在需求结构失衡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投资率过高是怎么造成的呢？和过去长期持续的货币宽松有关，和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政府投资的大规模扩张有关。这些现象使得一个时期内投资率不断上升，反过来挤压了居民消费，消费率一直在下降，从而迫使居民储蓄率也在不断提高。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投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储蓄；另一方面，投资对消费产生挤压，也导致了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费增长乏力。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结构性管理，需要在需求结构方面进行调整，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那些效率不高、必要性不大的投资退出，提高投资效率和精准度，同时把政府支出重点放在改善民生、改善居民消费条件、促使消费回升等方面。在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凯恩斯主义理论讲，总需求不足就需要刺激，他的假设前提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可以完全替代。若消费者的储蓄率高，消费率低，怎么办？就扩大投资需求来代替消费需求。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只有短期的替代性，短期扩大投资可以暂时扩大总需求，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持续的货币宽松、持续的政府投资扩张就会导致供给侧的扩张，产能过度扩张会进一步导致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结构失衡，而且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迫使居民储蓄率进一步提高。所以，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持续的刺激政策会导致内需更加不足。

因此，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只适合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作为短期政策来应用，而长期持续地应用就会导致需求结构失衡。我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本来我们的投资率一直较高，消费率一直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刺激投资、再持续搞货币刺激和政府投资扩张，带来的需求结构失衡情况就会更严重。因此，这种持续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表现得特别显著。根据我们过去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我个人认为我国的投资率最终要恢复到2000年前的30%到40%之间这一水平，这是比较合理的；消费率则要回升到60%到70%之间的水平，相对而言这是更合理的。同时，要考虑到在经过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后，我国在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未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空间不会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所需的投资率可能还可以降得更低些。而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通过一系列措施，促使消费率回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而言是非常必要、非常关键的。

■在推进和落实需求侧管理时的重点是什么？

落实需求侧管理，我认为当前重点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货币政策要回归中性，逐步消解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逐步降低债务杠杆率。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跟着美国走，美国搞宽松我们也搞宽松，美国货币宽松带来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由世界各国替美国承担的，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而我们持续宽松造成的负面效果完全由国内老百姓自己承担，这一点和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

第二，财政政策需要从过去以政府投资为主转向改善民生为主，减少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政府投资，花更大的力气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现在未获得城镇户籍的新城镇居民有 2.3 亿人左右。没有纳入到城镇职工各项基本社保的城镇劳动者人数，在 1.3 亿-2.4 亿人之间，基本上都是没有户籍的外来劳动者。他们长期在城市就业，但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失业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基本不能享受住房保障，子女上学的困难很多。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启动内需就不能落到实处。因此财政政策要转向，主要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相应的，政府支出结构要转型，改变过去投资过多、行政支出过多，而社会保障有重大的缺口、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状况。

第三，建议大幅度放宽城市外来人口的落户标准，包括大城市在内，基本上做到在城市就业三到五年可以落户，社会保障覆盖要跟进，通过加大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的力度，来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

第四，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对城镇而言要以全部常住人口为基数，不要以户籍为区分。首先要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最基本的服务条件，下一步还要解决保障性住房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充分覆盖的问题，解决九年义务教育向十二年义务教育过渡的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要根据各地财政达到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能力和社保基金的缺口来制定方案，财政转移支付要跟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走，要建立统一标准，通过这样一个转变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最后还要加快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抑制高地价高房价，这对于纠正供给侧结构失衡、纠正需求侧结构失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作者：王小鲁，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Top](#)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伦理转向】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完善全球治理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倡议正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伦理转向。

■环境伦理缺失影响全球环境治理

人类一直痴迷于科技进步而不是伦理提升。科技快速发展和伦理缓慢生长，导致地球生态系统被肆意改变，环境状况持续恶化。全球环境变化实为人类缺失道德所致，说到底是一个伦理问题。但国际社会却主要依靠科技与制度来加以应对，而不是通过对国与国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注入环境伦理以寻求彻底解决，这就使全球环境治理出现严重赤字。

一是价值目标缺失。由于环境伦理尚未跨越国界，尚未锁定在人与人之间，各国长期缺乏命运共同体意识，并未意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一个生态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而未把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

二是责任意识薄弱。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一直缺乏一种为了本国、他国、人类乃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息而承担责任的意识。结果，各国是否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完全由它们自主决定，最终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三是推进动力不足。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好比一辆二轮推车，即只有科学之轮和制度之轮，没有提供牵引力的伦理之轮。而且，由于在治理目标设定和责任划分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各国难以真正齐心协力，导致国际合作治理的力度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程度不匹配。

■给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伦理支撑

全球环境治理需要伦理价值指引，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倡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各国是命运共同体，构成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



律的本质揭示，并为人与人关系、国与国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确立了环境保护的社会伦理、国际伦理和自然伦理。这三种伦理叠加而成的全球生态伦理正在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确立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弘扬人类命运与共的全球伦理精神，培养同舟共济、共生共荣的全球伦理意识，最终把生态危机隐现的“地球村”建设成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确立了全球环境治理的价值目标。

强化责任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就是承认人类，包括个人和国家，应基于其身份担起应尽的责任。由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各类国际行为体都应当有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意识和担责意愿。增强推进动力。由于国家之间在相关责任分担上分歧严重，加之一些国家搭便车，致使全球环境治理的推进动力严重不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家间关系确立了一种新范式，通过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革新传统逻辑，强化国家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

■命运与共下的全球环境治理需要伦理转向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各国形成一个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如同坐在同一艘因发生故障而危在旦夕的太空船上，此时必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避免自身的毁灭。为此，改善全球环境治理需要进行伦理转向。

首先，进行动力系统的全面升级，即从二轮驱动到三轮驱动。由于对污染环境没有负罪感，人类一直以来仅依靠科技和制度来驱动全球环境治理，其有效性和公平性不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应给全球环境治理增加伦理之轮，这样不仅能够全面改进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力系统，而且还可促进法律制度和技术的友好化，加快治理步伐。

其次，对价值取向适度校准，即从国际环境正义到全球生态正义。为了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普遍安全和清洁美丽的世界，全球环境治理需要超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环境正义，追求全球生态正义。世界环境正义致力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人与穷人、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之间，实现环境利益的公平分享、环境风险的公平分担、环境责任的公平分配。此外，还应当对国际环境正义做“种际”延伸，即人类要考虑其行为对于其他物种的影响，因为人类与其他物种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最后，对治理支点进行根本转换，即从国家环境主权到全球生态责任。对于全球环境治理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出人类“共在与共荣”，各国应共商共建共享。其中最重要的是应共担，即共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在主权国家对环境保护作为或不作为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的当今时代，需要给主权国家设定相应的环境保护责任，使其不再推卸应承担的相关责任，使“共同责任”与“有区别责任”之间实现联动。（据《光明日报》）

[Top](#)

【智利扩产又增税 全球铜业揪心】

一天之内，智利接连爆出多条大新闻。先是智利央行公布近 20 年来最大幅度的一次加息，之后智利政府对未来 30 年的采矿政策蓝图、通过矿产企业税的立法提案更是与智利的铜矿产业息息相关。而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这里的一举一动不仅牵动着全球大宗商品投资者的心，更影响着从去年已经一路狂飙的铜价。

■蓝图定调 30 年



8月31日，智利政府公布了对未来30年矿业政策的蓝图，罗列了要求本国矿企提高可追溯性、在长期干旱的情况下减少用水量以及加强领导层多样性的计划。其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铜矿生产量。具体而言，智利的目标是在2050年前保持目前28%的市场份额，并将年产量提高至900万吨。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数据显示，智利的铜、锂供应量约占全球供应的1/4，2020年全球铜矿产量约为2000万吨，其中智利产量约为570万吨，排名第一。而如果按照智利的打算，该国需要将产量提高57%。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许多矿企已经行动起来了。智利国有矿业公司Codelco是世界最大的铜生产商，目前已经正式启动总投资高达14亿美元的萨尔瓦多铜矿（Salvador）扩建工程，这将使该矿的生产寿命延长47年，产量增加近50%。

萨尔瓦多分部目前的生产力是智利矿商所有矿床中最低的，去年产量仅为50600吨，略低于Codelco总产量的3%。通过露天开采，该矿每年可生产90000吨。扩建后的全面生产计划于2023年上半年开始。除了产量的话题，智利政府还在报告中表示，希望到2050年，将矿业公司申请环境和经营许可的等待时间减少一半，并增加稀土矿物和锂的生产，后两者如今对电动汽车和其他商品的生产至关重要。矿业采集也与用水息息相关，对此报告提出，希望到2030年矿业公司能将来自冰川、河流和湖泊的用水量减少到总用水量的10%，到2050年进一步减少到5%，目前这一比重约为18%，并希望矿业公司能在2040年实现碳中和。而对于矿企提高可追溯性，报告希望矿业公司确保到2030年大型矿山的生产实现100%可追溯，到2050年中小型矿山的生产实现100%可追溯。

智利能源与矿业部长Juan Carlos Jobet表示，根据国家矿业政策(PNM)，该行业的公共和私人参与者有责任团结起来，保持智利在现代矿业世界的领先地位。他在智利北部矿业城市Calama的一次演讲中称，“这个政策框架不仅对企业有吸引力，对公共当局也有吸引力”。

■铜矿国中最高税

在蓝图出炉的同时，智利矿业目前正处于紧要关头，因为该国政府正试图更多分得矿业强劲营收的“一杯羹”。就在同一天，智利国会参议院矿业委员会以3票对2票批准了一份关于铜矿特许权使用费的立法草案，可能使该国成为全球矿税最为沉重的铜矿国。加税是因为智利和全球其他铜矿国一样，正在寻求更大份额的矿业利润，以解决因疫情而加剧的不平等问题，从而帮助智利经济尽早从新冠疫情的打击中复苏。不过，此法案还没有最终落定，还将交由该国参议院全体表决，并可能提出修改意见。但这项法案的支持者们表示，它将取代目前的利得税。此前，智利众议院已于5月通过早于2018年就提出的法案，要求对矿业巨头征收特许权使用费，并与国际铜价挂钩。

据了解，智利的大多数大型矿业公司都签署了税收稳定协议，直至2023年。所以也有政府官员建议两种制度可以同时运行。

彭博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几大铜矿国的铜矿特许使用费征税标准在41%左右，秘鲁为40.7%，南澳大利亚为44.6%，英属哥伦比亚为40.1%，墨西哥是41.6%，智利现行的是41.6%。而智利提议的铜矿许可费增长到82.3%，提议的另一项用来取代当前利润税的征税标准为56%，都较现行的标准有大幅度的提高。高额的税率自然引发了行业的不满。智利矿业行业此前曾警告，若按照目前的情况将销售税等级随着铜价上涨而上调，料将阻碍投资，削弱智利矿业领域的竞争力。

还有经济学家对此评论称，该法案将使智利铜矿企业税收远远超出其他铜生产国，从而削弱其竞争力，并在智利造成沉重的税收负担。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目前智利正在起草一份新宪法，可能会在 11 月总统选举之前，在水资源、矿产和社区权利方面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对全球铜价影响几何

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的一系列操作影响着全世界铜产业的走向。比如 8 月初，位于智利北部的世界最大的铜矿 Escondida、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Codelco 的 Andina 和日本矿业金属公司的 Caserones 三家铜矿因为员工对薪资不满而停工。彼时，不少行业人士担心，在全球经济持续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中复苏之际，此举可能会导致铜这一关键金属的供应出现中断。而一旦铜供应出现问题，全球铜市场将掀起“轩然大波”。

自去年以来，乘着大宗商品的风，全球铜价也一路飞涨，成为了“疯狂的石头”。今年 8 月 6 日，沪铜主连为 69790 元/吨，再次逼近 7 万关口。铜价上一次进入 7 万元/吨区间还是在 2010 年 12 月。8 月早些时候，必和必拓和工会达成补偿协议后，Escondida 铜矿在最后时刻避免了罢工的命运。但 Caserones 铜矿公司和工人谈判仍未取得进展。Capitalight Research 预测，2022 年全球铜需求将增长 3.8%，达到约 2500 万吨。需求不断上涨，供应却面临危机，可能使铜价再攀高峰。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从基本逻辑而言，增产总的来说会使供应端有所缓和，但智利政府向铜矿公司征收的税收增加将大大降低生产意愿，将引发市场对铜供应前景的担忧。对于铜价的走势，丁少将认为，短时间铜价依然不稳定，或将进一步上涨。他进一步分析道，推动铜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复苏，预计 2021 年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达 5.5% 左右，包括铜在内的原材料的需求会稳步提升；二是碳中和等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对铜产品的需求极速提升；三是各国刺激经济政策的出炉带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无疑也会推动铜价的继续攀升。（据《北京商报》）

[Top](#)

【供应链危机 全球航运业瓶颈难消价格居高不下】

苏伊士运河堵船事件早已告一段落，但全球供应链头顶的乌云仍然没有散去。东南亚的疫情、错位增长的需求，让海运面前的关卡一道接着一道。从越南胡志明市到美国洛杉矶，集装箱堆满码头，货轮排着长队等待卸货。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上游制造业还是下游消费端，无不面临着一箱难求、运费飙涨的被动局面。从当前疫情形势来看，海运业的不堪重负大概率还会持续。

■拥堵！涨价！

“仓库货满为患，铁路货场和车厢已装满，集装箱仍一箱难得，船舶进港并在锚地等待，工厂产量已经创纪录，但仍跟不上订单速度”，面对当前的海运行业，洛杉矶港执行董事 Gene Seroka 说道。这不是夸张。今年前七个月，洛杉矶港的货运量达到 630 万标准箱，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36.8%。进入下半年，作为美国西海岸的两个主要集装箱港口，洛杉矶港和长滩港日益不堪重负。上周早些时候，有 37 艘大型集装箱船停泊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外。8 月 26 日，两个港口均创下了最高拥堵纪录，拥堵情况比 2002 年和 2004 年港口暂时关停时期还要严重。而船只的平均等待时间已经从 8 月中旬的 6.2 天上升至 7.6 天。

Gene Seroka 用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 Daniel Maffei 的话来形容现状，“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将 10 条高速公路交通车道的车流并入到 5 条中，肯定会拖延”。不只是洛杉矶，全球大多数港口都被塞满了。根据德迅集团海运平台



seaexplorer 的统计数据，截至 8 月 27 日，超过 355 艘船舶停泊在港口外，因为全球的许多港口都面临运营中断。在两个月前，受影响的船舶才刚超过 300 艘。迟到也成了常态。全球大型货运经纪公司 C.H. 罗宾逊物流 CEO Bob Biesterfeld 指出：“目前货船准时到达的几率是 40%，而去年这个时候是 80%。”

水涨船高，日益严峻的拥堵之下，海运的运费也肉眼可见地蹭蹭上涨。C.H. 罗宾逊物流发布的世界集装箱指数显示，在截至 8 月 19 日的一周内，一个 40 英尺集装箱在东西向 8 条主要航线上的综合运输成本达到 9613 美元，较上年同期上涨了 360%。价格涨幅最大的航线，40 英尺集装箱的价格飙升了 659%。

以中美航线为例，截至 8 月 27 日，中国/东南亚至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从 8 月初每 FEU（40 英尺标准集装箱）20636 美元高位回落一周后，再次回归 2 万美元大关，目前价格为每 FEU 20057 美元，比前一周增长 5%；与此同时，中国/东南亚至北美西海岸航线运价略有回落后也正持续上涨，运价为每 FEU 18425 美元，比前一周增长 5%。

■时空都“错位”

数据背后，海运企业们时而欢喜时而忧。“肯定受影响，”上海熙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永恒语气肯定，他表示，总体来看，现在整个行业就是运费越来越高、仓位紧张、船期不稳定、国外卸货慢。“很多低价货值或者利润较低业务基本都没法出运了，很多客户的货物都积压在仓库里”，张永恒说，现在运费变动很频繁，很多货主刚和国外谈好价格，等货物生产好，运费又变了，经常来回折腾。另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销售人员陈闯表示，对于这种变动，他已经习惯了。现在基本都是供不应求，排仓一周起步。在运费的持续上涨下，陈闯也很无奈，“上周到本周，涨价都很明显，基本都是上涨 3-5 元，但 500kg 以上的货物，1kg 的利润一般才 1、2 元左右，这样直接就亏了很多”。根据上海航运交易所的最新数据，截至 8 月 27 日，代表即期价格的上海出口集装箱指数（SCFI）为 4385.62 点，创下历史新高，相比去年的最低点 820 点，涨幅高达 435%。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看来，造成现在海运行业紧张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时间上的错位，原来在疫情紧张时期，外贸运输受限，但现在，我国疫情得以缓解，陆续恢复对外出货，造成海运业务量加大；其次是空间上的错位，一些地区仍然受到疫情影响，导致一些货轮无法进港，需要转到其他地方，从而导致港口排队甚至拥堵。

以越南为例，7 月以来，越南疫情严峻，当地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疫举措，8 月初，该国最大港口卡莱港被迫暂停运营，码头工人数量被削减到之前的一半，叉车司机和货车司机也面临短缺，导致集装箱堆场接近饱和。无奈之下，8 月上半月，该港口都暂停处理转运箱和转运货物。另外，从需求来看，白明还提到了一点，需求和供应的非对称，以中美航线为例，我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多，而从美国进口的少。眼下，在洛杉矶港，集装箱的进出口比例已达到 5:1。洛杉矶港负责人曾感叹，“我们最大的出口是空气”。美国零售联合会指出，“8 月是传统‘旺季’的开始，零售商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提前囤积节日商品。许多零售商今年都在这个时间点提高装运量，这是他们降低风险策略的一部分，以确保在节日期间能够有足够的库存”。

■供应链危机

不只是中美航线，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指出，中国在制造业、货物贸易领域的能力比较强，而美欧等地虽然疫情严峻，但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没有降低，也不太可能阻滞货源，从而导致集装箱



压港问题比较严重；再加上，船运公司可能考虑到，与其在港口等待，不如回到货源地，这样也会加剧堵塞。瑞银在研究报告中预计，港口拥堵情况将会持续到2022年。而这种大规模拥堵导致船舶排队停靠和船期延误，挤占主要贸易航线上的大量运力，严重拖累了航运效率。全球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集装箱被堵在港口的同时，等待运输的生产商已经急不可耐了。在南美，肉类出口已经是个大问题。巴拉圭肉类商会（CPC）主席 Kornel Pauls 表示，由于缺乏海运集装箱、运输成本飙升和运输时间不稳定，该国肉类加工商本月的屠宰量可能会减少20%-25%。不止是上游，下游的消费端也发出了警告。比如美国玩具生产商孩之宝就打算提价，以应对不断上涨的运输成本和原材料价格，公司预计今年的海运费平均将比去年高出4倍。“除了商品价格提高，消费者还需为动辄数周的货运延误做好准备，以免在购物季来临时空手而归。” Biesterfeld 指出。

“现在这种情况，也不能说供应链中断，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疫情程度不同，每个国家的防疫措施、市场需求的变化不一样，当然也叠加了一些国家本来就有的经济难题，比如这些国家在生产、制造、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问题，从而导致了这种比较特殊的海运市场波动。” 张建平指出。在本轮“超级周期”中，赚得盆满钵满的船运公司调高了盈利预期。马士基最新半年报显示，公司二季度净利润达37.32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3.59亿美元，创下该公司有史以来的最好季度业绩。至于这种非常态何时能结束，张建平坦言，现在不太好判断，外贸市场一般波动性比较大，这与进出口的增速、市场需求、其他物流方式能不能做补充等多种因素都有关，“但的确，现在集装箱的价格高得离谱，都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在白明看来，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比如通过中欧班列减少对海运的依赖，也投入了很多集装箱，但只能说是缓解，短期内要想彻底解决，还是不太现实的。Biesterfeld 则认为，港口拥堵、运费飙升的问题可能要到2022年2月农历新年后才会缓解。（据《经济日报》）

[Top](#)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把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退休年龄改革需要社会观念变革与制度实践创新】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改革事关国家社会保障和公民劳动就业以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一项十分重大和非常敏感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其推进和实施需要经过科学研究和慎重决策。本文从重新认识和定义老年人的认知层面、保障老年群体经济参与权利和拓展老年人自我发展需求等更宽阔的宏观视角讨论这一议题。

一、我国退休年龄的历史变革

19世纪80年代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退休和养老金制度，此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工业革命以后，为适应现代化生产模式和社会风险集中管理而建立的现代管理制度，并历经一百多年不断发展完善。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始于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条例》规定，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职工为50周岁，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中增加规定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仍然沿用此前的规定，但对特殊工种和岗位的提前退休做了补充说明：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性为年满55周岁，女性为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公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性年满50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

此后，我国再也没有就退休年龄政策进行过重大修改。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5年3月10日，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会上表示：“人社部将向



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2020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1年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2021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至此，延迟退休已进入实质性推行阶段，改革方案呼之欲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是：1963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年，当年出生了2900多万人，此后近十年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500万以上。到2023年，1963年出生的男性就将满60岁，会大量退休。届时和之后，本已脆弱的养老金体系将遭遇一个巨大的短时冲击。也就是说，未来数年，改革的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尽管官方态度积极，但延迟退休的民意基础一直较为薄弱。相对陈旧的社会观念和认知混沌成为实质性推进退休年龄改革的思想桎梏。一场全社会对老年人价值与劳动权利再认识的思想革命迫在眉睫。

二、低龄/准老年群体劳动就业意愿与能力现状考察

首先，低龄老年群体在业率超三分之一，准老年群体对劳动就业的意愿较为强烈。老年在业人口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在业率是反映老年人力资源利用和供给状况的重要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该群体的劳动就业意愿。2017年我国老年低龄和准老年群体的在业状况见表1。由数据可知，2017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现行定义下的老年人）有超过20%仍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劳动；其中，60至64岁组的低龄老年人在业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这表明，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老年人健康水平下，我国低龄老年群体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劳动参与。

分性别看，老年男性在业比例始终高于女性，其中60至64岁组的男性高于女性18.9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农村低龄老年人在业比例远高于城市，其中60至64岁组农村老年人在业比例超过一半，城市老年人在业比例也超过20%。诚然，低龄老年人口在业率的城乡和性别差异与现行城乡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障设置的二元体系有关，但即便如此，我国城乡低龄老人都有着较高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意愿，亟需寻求一种更加多元和灵活的劳动就业模式与此适配。

表 1. 2017 年我国低龄/准老年群体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人口在业比例(%)

年龄组	合计	性别		地区	
		男性	女性	城市	农村
50—54 岁	62.19	76.93	49.32	61.61	62.99
55—59 岁	49.86	69.84	32.29	41.84	61.75
60—64 岁	33.84	43.63	24.76	22.11	50.52

其次，低龄老年群体占劳动总人口的比重近8%，准（潜在）老年劳动人口数量巨大。根据联合国报告《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公布的中方案预测，2020年我国60至64岁老年群体的人口规模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的比重为7.66%，人口规模约为7751万人；55至59岁人口规模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为9.76%，人口规模近9874万；50至54岁组的这一比重更是高达



12.20%，人口规模达到 1.23 亿。在目前的劳动就业市场和社保的制度安排下，如此体量的低龄和潜在老年劳动人口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使得原本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成为社会产品的消耗者，其中蕴藏的丰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第三，老年群体的健康预期寿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水平接近，健康素养水平较高。

国民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的持续改进是延迟退休的前提条件。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2019 年我国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 77.4 岁，健康预期寿命为 68.6 岁，相较 2016 年有所延长。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劳动者退休后余寿的延长，对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则意味着养老金支付期更长。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延长后的寿命中保持健康状态的余命增加，理论上说可以继续工作的寿命也在增加。从我国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的绝对值来看（见表 2），我国老年人口 60 岁的健康预期寿命近 16 岁（15.92 岁）。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我国老年人 60 岁之后还可以健康存活的时间为近 16 年，与美国（16.35 岁）基本持平。而 2019 年美国的退休年龄为男女同龄，均为 66 岁，分别比我国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高出 6 岁和 16 岁（11 岁）。

表 2. 2019 年世界主要国家的 60 岁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

国家	60 岁预期寿命（岁）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岁）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
中国	21.06	15.92	75.6
日本	26.35	20.39	77.4
新加坡	25.54	19.95	78.1
印度	18.82	13.25	70.4
美国	23.13	16.35	70.7
加拿大	25.15	18.89	75.1
英国	24.13	18.25	75.6
法国	25.34	19.70	77.7
德国	24.41	18.47	75.7
意大利	25.04	18.91	75.5
澳大利亚	25.62	15.92	74.1

从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占比来看，我国已与英国、德国与意大利等 OECD 发达国家相近（上述几国的退休年龄均大致为 66 至 67 岁），仅次于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和东南亚发达国家，甚至高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未来健康预期寿命将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我国退休年龄改革的制度安排模式应该充分考虑对上述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快速提升的现实进行必要的调适，通过逐步延长工作时间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人口的健康红利。

第四，低龄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良好，准老年群体受教育水平超一半达到高中及以上。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进入就业市场的年龄推迟、需要养老金支持的年份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人口队列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等与劳动就业相关的人力资本的提升。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至 64 岁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比例为 53.9%。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 24.3%，说明有超过五分之一的老人教育层次较高。而在准老年群体（55 至 59 岁）中，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升至 68.2%（见表 3）。



表 3. 2017 年我国低龄/准老年群体分年龄受教育程度占比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
50—54 岁	34.70	36.51	17.68	11.11
55—59 岁	31.81	31.25	29.76	7.18
60—64 岁	46.06	29.68	17.18	7.08

这表明,我国未来即将进入延迟退休的准老年群体具有较高学识水平和再学习能力,有足够的智力水平和知识储备继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综上可知,我国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人特别是准老年群体,在主观上有着较强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意愿,在生理功能和智力储备上也较大程度上具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可以也应当充分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本。

三、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

我国逐步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已是大势所趋,箭在弦上。但无论最终实施何种退休年龄调整方案,在政策正式施行之前,全社会应就下述几项观念重塑与制度创新达成基本共识和广泛认识。

首先,没有年龄歧视的社会经济参与是老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2002 年 4 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老年人是资源,年龄就是资产”的观点。老年人自身蕴含的经济产出能力、文化传承和社会价值等资源,是可以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呈现并发挥作用的。在工业化时代,确定退休年龄并给予老年人口养老金是一项重大社会进步,也构成了劳动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工资决定的基础。老年人口在逐渐退出劳动就业市场以后能够公平分享社会经济成果,是老年人口的一项基本权利,也可以体现社会公平。老年人口有全面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利。没有年龄歧视的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支柱,也是老年人口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主要途径。但我们在强调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时候,通常会忽视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包括继续工作和就业的权利。

延迟退休政策当中也应包含保障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参与权利,避免以年龄为唯一标准的歧视和排斥。延迟退休政策的讨论应更多纳入老年人口基本权益的考量。其次,延迟退休是激发老龄社会人力资本红利的重要举措之一。从世界范围的趋势来看,一些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原已普遍晚于我国,仍在进一步延迟其国民的退休年龄。如日本,已在 2021 年 4 月通过实施相关法律,将企业员工的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了 70 岁。又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将在 2023 年至 2029 年期间陆续将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推移至 67 岁,英国将从 2037 年之后逐步将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上推至 68 岁。一些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也是如此。这些国家推动退休制度的改革动力主要是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抚养比越来越大,原有的养老金制度无法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但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寿命延长的同时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这意味着劳动者拥有了更高的健康资本,从而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由此产生新的人力资本红利。这也为这些国家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改革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可以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已有研究表明,在 60 岁以后继续从事一些工作能够对低龄老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从生理层面来讲,适度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当于参加了一定程度的锻



炼，能够促进身体健康。从精神层面来讲，60岁以后的老人继续参与一些工作，在退休金之外可以获得更多经济收入，从而获得更多财务安全感和来自社会的价值认同，也可以维持甚至拓展他们的社会网络，避免与社会经济生活脱节。

第三，以逐步推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拓展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空间。我国目前实行的主要基于现收现付原则的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对老年人过去劳动成果的补偿。这种制度设计在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作用的发展阶段运行良好。但在人口老龄化和现代经济增长动力变化双重因素作用下，现行养老金制度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在延迟退休年龄这一大方向已确定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首先尝试逐步推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即在保证退休年龄下限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提高部分劳动人口退休年龄的上限值，并尊重个人（被雇佣方）和企事业单位（雇佣方）对退休时间的双向选择，逐步实现退休年龄弹性化，逐渐淡化由国家硬性规定退休年龄的制度安排。

同时，逐步把“退休年龄”的提法转变为“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并遵循“早减晚增”（提取养老金的年龄每提前一年，按一定比例减发；每推迟一年，按一定比例增发）原则，用以规范不同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的结构比例，以保障和激励更多老年人口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尽可能推迟提取养老金，缓和短时间内养老金提取的冲击效应，延后低龄老年群体由生产性人口向纯消费性人口转化的时间窗口的到来。

第四，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行应兼顾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并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学者们在讨论延迟退休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时都是将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并未加以严格区分。但通常来讲，流动性较差、劳动力就业规模缺乏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容易受到延迟退休政策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市场，延迟退休带来的低龄老年劳动力供给增加会导致有限就业空间被挤占，与青年群体的就业形成交集。流动性较好、劳动力就业规模弹性较大、更具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则受延迟退休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

另外，在某些劳动力市场，新增的低龄老年劳动力需要配给相应的辅助岗位，会由于延迟退休的推行带来新增就业岗位，从而对就业市场带来积极影响。因此，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延迟退休的政策敏感度不同，在政策实施中应从受延迟退休政策影响较小的劳动力市场开始试点推行改革。

第五，延迟退休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和政策的配套。延迟退休的改革不仅仅是退休年龄的制度安排，还需要对一系列现存制度、政策和项目的整体性改革和完善。首先，我国目前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虽然法律已经规定了老年人口可以提供咨询服务，依法参与科技开发和应用，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等，但在延长退休年龄的改革过程中，过渡期老年人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权益保障需要更加明确和精准的规定，并且应当涵盖更广泛的法律内容。其次，考虑到我国老年人有隔代照料孙辈的传统，因目前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高，社会托幼服务缺乏，延迟退休年龄可能冲抵全面三孩政策推行的效果。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时，应同时考虑大力发展社会化托育服务、适时出台如“男性产假”、家庭税收减免计划及消除育龄女性就业市场隐形歧视等一揽子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

最后，政府应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对现行主要以休闲娱乐为主的老年教育体系进行适应性改革，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终身教育特别是老年职业教育中，以帮助老年劳动力在其职业生涯晚期仍能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并继续具有被雇佣的能力。



【来源：澎湃新闻，原题“退休年龄改革：社会观念的变革与制度实践的创新”，原载《社会保障评论》，作者：彭希哲，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宋靓珺，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

会员内部资料 请勿复制外传